

一个富有活力和魅力的创作群体

——专家学者评述“湖北女作家群”

高洪波（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湖北省作协将建制制的女作家推到文坛，在湖北文学发展中还是第一次。近几年湖北女作家得到了强势发展，现在湖北女作家的“双壁”是方方和池莉。方方、池莉的作品引领了以后湖北的女作家们去追赶她们，她们的中、长篇小说在我们文坛溅起一个又一个涟漪。有湖北女作家支撑的湖北文学是中国文学很重要的板块。文学不像其他门类比如体育那样有男女之间的区别，在智能、心理、理性和感性的组合方面，女作家可能更有优势，因为她们有独特的生命感悟。在文学界，女作家一只是比较重要的支撑力量。说起女作家，湖北文学界是应该骄傲的，在此我要向在文学上做出成绩的女作家表示敬意。

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在湖北确实有一支非常有才华的女作家队伍。我平时不太在意作家的性别，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它的意义何在呢？我认为写作是个孤独的事业，作家的写作某种程度上伤害了自身的生活，写作之外我们需要健康的文学生活，需要意识到还有和我们一样热爱文学和写作的人，当存在这个群体时，是有利于作家成长的。从文学的生态来讲，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作家还如此强大？不可忽视的是他们是一群出现的，形成了氛围和阵势，每个人都分享了这个氛围带来的益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北推出这个群体，构造了一个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有利于每个人成长的文学氛围、文学环境，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座的女作家中，我重点谈谈姚鄂梅，我觉得即使放在全国青年作家中，姚鄂梅都是出类拔萃的，表现出引人注目的才能，进步非常快。但就姚鄂梅来说，我始终有个想法，一个作家的成长到了这个阶段上，还是要努力把自己塑造起来，就是说你可能不得不作出选择，我到底要成什么样的作家，到底写什么不写什么，在整个作品中有个比较稳定的世界观。这对姚鄂梅来说是个比较迫切的问题。姚鄂梅是个天生有小说家才能的人，她的小说对人类经验的提炼非常广泛。但是我觉得将战线铺开的时候，可能在一定阶段还需要收拢过来，确立起来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方方还是池莉，当她们回顾她们成功的时候，她们一个非常强大的地方，就是一开始就如此鲜明地确立自己。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刘连宏（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

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自古可谓人才荟萃，文风鼎盛。湖北是文学大省，湖北女作家群规模大，成就高，是湖北文学的中坚力量。今天研讨会涉及的数十位女作家，就是湖北女作家的优秀代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北省女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这次湖北女作家群在首都集体亮相，希望与会的各位文学家、评论家对她们的创作进行批评和推介，扩大湖北文学在全国的影响。湖北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对湖北文学的发展给予更有力的支持，让湖北文学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黄运全（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近年来湖北省在京举行过多次作家作品研讨会，但专题就女作家群创作进行研讨尚属首次，因此具有特别意义。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展示女作家群创作成果，透视女作家群现象，提升女作家群素质，打造女作家群品牌，从而推动女作家以至整个作家队伍的建设，进一步繁荣湖北文学创作。纵观湖北文坛，“巾帼不让须眉”是不争的事实，湖北女作家群是一个富有活力和魅力的创作群体，创作成就引人注目。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女作家方方、池莉的创作树立了“新写实主义”的标杆，并且佳作频出，长盛不衰。湖北女作家的后起之秀相继涌现，创作了一大批文学精品，赢得了文学界的好评。总体上看，湖北女作家与时俱进，坚守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坚持“三贴近”原则，立足现实，关怀民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哗众取宠，不猎奇涉艳，注重从女性个体的人生经验与情感体验中，发掘湖北地域文化的底蕴，呈现出厚重见灵秀，平实出绚烂的特色。湖北省作协也将充分运用研讨会的成果，进一步做好服务作家、推动创作的工作，为女作家群的健康成长和创作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王先霏（湖北省作协原主席）：

湖北女作家一直是湖北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现在新起的湖北作家中，女作家也占有一些优势，对湖北女作家的讨论是有现实根据的。湖北的这些女作家年龄不大，但写作时间不短，表现出很强劲的气势，而且她们对文学投入更多，更执著，在她们生命中，文学占有实实在在的位置。阿毛有句诗“她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并不拒绝偏执和激情”，这可谓是湖北女作家的概括。待人的温和和思想的犀利是共存的。我关注王芸的创作，她首先是个散文化家，她的小说比较善于营造意象，但总观起来，王芸小说着力去写的、有特色的，是被挤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作家对这些“畸零人”的关切、同情和理解，对在社会变动中被社会错位齿轮绞杀的人生的表现，都显现出作者对人性、社会变动的思考。当然王芸小说编故事的能力差了点，怎样使作品既能吸引读者，又能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及在艺术上的探索，这三者都需要找到平衡点。

王必胜（《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自上世纪80年代文坛就提出了作家群、作家性别等等话题，今天湖北女作家群集体亮相，为当下寂寞的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兴奋剂，在当代文学研究集中是个好的话题。我觉得湖北女作家创作起点高，湖北是楚文化的代表，楚文化的风骨在湖北作家中体现充分，比如坚韧，我喜欢干里烟散文的率真、活力和坚韧，她的散文在当代散文中是有品位的。现在，虚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和高扬已弱化，但创作立场没有丢失，比如散文有很多还在高扬人文精神，这种高扬来自坚持文化的风骨。华姿的散文宗教意味浓，她通过人生世俗的生活状态，写出心灵的救赎，既入世又出世。这也是种坚韧。王芸散文的特点是古雅，在楚文化的沃土中去挖掘一种新的意义，在辞典性的写作中看出作家的文化自觉。湖北的作家不张扬，我觉得文坛对他们有点亏待。湖北女作家作为个体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作为群体希望在这个研讨会之后走得更远，作为楚文化的继承者，最大的问题是要在南北文化交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湖北的文化崛起应是这两种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以在创作中作家们要有更高追求，要走出中部，走出湖北，有宽阔的文化眼光。

江 岳（评论家）：

对于“女性写作”热的升温，我有点看法：一、灵魂比身体更重要，二、“人”字比“女”字更重要。优秀的女作家和进入文学史人物画廊的女性往往并不以外在姿色取胜，关键在于寻找她们优美的灵魂。人欲横流的物化现实已消解了肉身承载的反拨压抑的革命意义。马克思在其著名的《自白》中，将女人最珍贵的品德概括为“柔弱”。这包含着女性温柔善良的内心状态和不争的外部姿态两个方面，可以视为女性优美灵魂的本质特性。从马克思推崇的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看，是不断走向和谐和温柔的，与妇女解放的进程相吻合。从现实状况看，修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紧张关系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更需要女性的温柔。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就曾对“柔弱”有过深刻的论述。“人”字的结构就是男女相互支撑，以求平衡。只有超越“女”字，写好“人”字，才能真正写好“女” 字。“女性写作”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既取决于对女性审美视角的深度开掘，又取决于对女性单一性别的不断超越，联结两者的是人的生存与全面自由发展。

对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写作者而言，对其作品的评论不小心就可能陷入蹉跎与尴尬，但从写作是对生活真相的发现这一点看，任何评论和解读都是可靠的。因为，发现真相往往也就意味着揭示意义、延伸见识，小说如此，评论也是如此。

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卡洛尔·奥茨说，经常有人问她“你为什么要写作？”在有的年头这个问题提问的频率居然能够达到每周一次之多。遇到这种情况她就随便说一句：“因为我喜欢”，以便让那些自以为是靠想象力吃饭而具有无比优越感的人得到一些满足。回过头来，奥茨认真思考作为“靠想象力吃饭”的作家的写作动力到底在哪里，她觉得，作家只要想写作，就说明是希望“指出我们因为麻木不仁和不求甚解而认为很简单的那些事实的奥秘”。由此观察姚鄂梅的小说，也许可以找到一些便于理解的切入点。

姚鄂梅的小说往往是追着生活的真相写的，她探究、发现、展示真相，她有部小说的名字就叫《真相》，能够紧紧地抓着读者的好奇心展开情节，她笔下的故事一般由一两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开始，由此驶向狭长而幽深的结局，如《妇女节秘密》里的女主人公丽杨，是单位同事眼里的秘密，也是读者眼里的秘密，随着秘密的揭开，我们看到了事情的“真相”，一个破落的小职员对一个女性进行了卑劣的欺骗与嘲弄，她的作品那种很强的吸引力，来源于对真相的勘测，来自对情节收放中技巧的掌握，总是牵引着人们

俗世中隐现的星光

□雷 达

新时期以来，普通人的世俗化生活成为诸多作家肯定和表现对象，当历史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文学就归还了一个个肉身的人。这曾是创作上的一大进步，并有许多优秀文本相随产生。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就是典型征象。最近，我集中读了青年作家李榕的一些中篇小说后发现，她也在着力表现俗世男女的恩怨恩怨，人间烟火的忽明忽暗，然而，她显然又在其中注入了某种新的元素，她的人物虽沿着陆文婷、印家厚们的脚印走，但终究拐上了各自陌生的路。时代正在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她注重把日常生活的无奈与人性的光芒整合在一起，但这一切是深隐的、含藏的、淡朴的。这样一作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格调，似乎在当下青年作家中并不多见。

《深白》是李榕的代表作，全篇只三万余字，却展现出了密集的信息与深入的思考。主人公高飞是一位女医生，尽管她生活得小心翼翼，还是陷入一个巨大的无形漩涡。在生活上，她自小活在母亲的压制之中，向来都是过分的谨慎。她尚年幼的时候，做教师的父亲抛弃了做医生的母亲和她，随着一个脸黑鼻塌的街头裁缝走了。所以，性格要强的母亲把她名字由高非改成了高飞。这个令她痛苦的父亲却在她婚后不断地找她要钱。她虽从小和母亲生活，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母爱，只觉压抑，母亲的逝世令她无比恐惧。就她自己而言，第一次婚姻失败了，没想到第二次又面临离婚的局面。作为母亲，高飞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抚养独生女儿。同时，她惟一的好友医院的家庭也非常不幸，其人还患了癌症。在医院，高飞因为不能忍受同在一个单位的前夫的刺激，调离了原来的科室，每天承受的不仅是超强度的工作，还有极大的心理压力，似乎人生除了疲惫与烦恼就别无他物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高飞做人很失败。读至此，我们会觉得，烦恼人生的写法又来了。然而并不，李榕在不经意间让这样灰色的俗世闪现出了一种不太亮却足以增添自信的光。高飞发现，父亲对她仍然有着无法泯灭的关爱；表面上冷酷无情的公婆对她和女儿也疼爱有加，婆婆为了孙女还摔坏了自己；好朋友不顾一切帮助她；前夫表面上风流轻佻，内心深处最爱的还是她；第二任丈夫在车祸发生的一刹那为了救她，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最终，高飞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岗位并把自己的专家点了名去深造。一切都过去，太阳又是新的，灰色生存皆因这些美好的人性光亮而变得不那么烦恼和重要了。看，一个可能重蹈烦恼人生的无限循环之路的、或时下女性主义的幽怨倾诉的文本，就这样踏上了另外一条路徑。

李榕的其他中短篇小说也都具有这样的品性。《忽然之间》里求医无门的张美心于绝望中发现，自己跪地相求的名医尹学文竟然是自己儿时给予过

我一直在“纸上铁轨”与“白色的纸，长满黑色的钻石”两个句子间犹豫不定，因为阿毛的诗中，有冷、硬，有坚韧、不屈，有经得住时光打磨的东西，如暗夜钻石，在深不可见的低处闪着光，也如仁厚的铁轨承载着千钧的重量。最早读到她的诗是在几年前的《芳草》上，写得极为灵动，那些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跳跃性极强，如剑舞空中，到终结处，又收得极为利索干净。这是谁？后来武汉去，在东湖边的会议大堂，一位女子穿越人群走向我，递过手来说，我是阿毛。谢谢你喜欢我的诗。这是她？她灵巧纤弱的样子与她烈焰冰凝铁骨破肠的诗正成反比，我一下子想起了曾与刘醒龙提到过对她诗的认同。

火车以它的尖叫/代替了别的呼啸。但盲者却从漂流木做的/笛子里听出苍凉。写出这样句子的诗人在《纸上铁轨》中写：“我还没出生，纸上就铺满铁轨——/安娜们捐躯，诗人们跑断钢笔。”如果只是一读而过，怕是要错过了女性与诗人这两个在她的诗中反复出现并得到强调的形象。“所以，我不停地奔跑在铁轨上/就是为了生下永生的你。”同一首诗中，她一下子又将两个形象合而为一，动词的“生”，使得女人与诗人找到了同为创造生命的叠印与呼应。要重视这个女性与诗人合而为一的创作者的形象，因为他闪烁在她的大多诗篇中，比如《献诗》，在书写给夜半、私语、前世今生、无音区、手指无法弹奏的区域，还有眼泪，晶莹剔透，却仍是话语抵达不到的地方，在这所有的“献给”之上，她最终写下了

发现生活的真相

□文 羽

去发现、体悟，使阅读的过程注定变为一次找寻之旅、发现之旅，有时还是惊异之旅。

姚鄂梅表现生活的“真相”也是贴着人的目光写的，她像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把普通人的生活，世间的万象收在自己的眼底，过滤、沉淀，然后发布出来。优秀的小说必须要写个别，或者说，作者必须通过个别来对社会现象发言。姚鄂梅捕捉到了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人的脆弱似乎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常态。她的不少小说写了平凡人的梦想的挫折、失落。如《摘日记》里的小锐跟阿珠，就是运道都很不济的女子，城里人小锐，个子矮、没工作，天天担心嫁不掉；外来妹阿珠怀孕6个月，天天担心“对象”不和她结婚，最后，阿珠没有结成婚，她抛弃了孩子，小锐不把这个孩子接过来就完不成道士算命时告诉她须摘够49个豆子的任务，“奇迹出现在她面前”，“后半生，她只能凭着这具小小的躯体，可怜巴巴地活下去了”。

从姚鄂梅所写的诸多故事里，读者看到了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尖锐、多样，似乎“无论男女，都

心灵温暖的私生子身材；尹学文儿时曾要放火烧死为了养活自己从事暗娼的母亲，此后这个孤独的生命不愿面对自己的母亲，但当他儿时灰暗生活中惟一的星光三丫头，也就是现在的张美心以绝对的宽容和坚强面对极度窘迫的生活时，他突然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与母爱，对着自己的母亲喊出了三十年后的第一声：妈妈！《马齿苋》中的韩老师孤苦无依，连起码的生存都成问题，却不顾一切地帮助那个曾经抢过她生意的问题学生苏林；苏林无父无母，却在帮助城市里被主人遗弃的流浪狗；而曾经间接导致韩老师丈夫死去的疤子，又在浪子回头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转而帮助韩老师，这连环套式的互助关系似乎在证明，他们虽然是俗世中最无助的一部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爱的精神。

李榕的中篇小说在艺术上是比较精致的，她的小说有如散文，往往会设置一个统领全文的意象，比如《深白》中的深白：“……医院里原来用做病床床单的面料，叫深白，的确是越洗越白，越洗越亮。”深白，正如俗世中的亲情、友情、爱情，就在那里，高飞却一直沒有发现，直到越来越走进生活深处，才会逐渐发现它们，它们同样是越洗越鲜亮的。《马齿苋》中的马齿苋：“马齿苋又叫五行草，它的根是白的，茎是紫色的，叶子是绿的，花是黄的，种子却是黑的。因为能入药人们也叫它神仙草，因为经得起阳光暴晒又叫它太阳草。它匍匐在地，烈日下，没人会给它浇水它照样鲜绿，倘若给它浇上水呢？它会不会因此蓬勃起来，茂盛到无可比拟……”在这篇小说中，马齿苋的生命力之顽强应该是作品中主人公顽强生存能力的代名词，不能生育而又失去丈夫的韩老师、几成孤儿的少年苏林、精神失常的老太太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都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却又都以顽强的姿态生存着，令人回味无穷。《忽然之间》里的北极星只在作品中出现了一次，却在尹学文的回忆中成为最闪亮的部分，尽管他们都成长于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但仍然有爱和关怀在身边，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星光，“亲人是这个世界留给我们最好的财富。还记得那颗北极星吗？它让我觉得这世界还很美丽，你也是如此。”尹学文在信中对张美心说。

尽管有人认为李榕的《深白》与谥谥的《人到中年》有某种相似性，尽管李榕在描写世俗生活上的手法让人想起了同样曾在武钢医院工作过的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作品，进而认为与新写实作家具有某种共同点。然而，时过境迁，我认为李榕作品的成功之处并不在和已有的作品的外在相似，而恰恰在于内在的相异，她能在细致入微的对俗世生活的雕刻中，让那些隐约的、人性的美好光芒显现出来，她追求一种“深白”式的或“马齿苋式”的淡泊中的顽强，透射出一种特殊的情调。我们生命中的星光不也是如此吗？

最后还想说的是，李榕中短篇小说在叙述上，包括在语言上，有过于细碎之嫌，缺乏更为透亮、幽默和一语中的的简洁，也缺乏更有底蕴和含蓄的话语——潜话语，以致对读者而言，缺乏一种更为强烈而深沉的阅读体验。这是需要不断磨练的。我相信李榕会越写越好。

只为生下永生的你

□何向阳

“给灯下写字的人/他半生的光阴都在纸上”这样的诗句。我不知这是不是诗人自况，但我以为诗人在以这样的书写描画着与她一样的人，这个人在写作中没有性别，或者说性别在这里并不重要的，诗人想要呈现的是写作者的作为人的精神与处境，这个人脆弱而坚韧，这个人在别人的树上结着金色的果实之时，不懈地开着纸上的钻石（《唱法》），这个人“遇到的只是微澜，而不是水滴石穿的奇迹”（《引力》）却仍然向往“在去理想国的路上，再彻底一点：/丢弃技术、原则、经验、真理……”（《在去理想国的路上》），这个人始终清醒，他知道俗世上人来人往，“一部分成为栋梁/一部分成为棍棒/一部分变成纸或灰/还有一部分，侥幸成了身体的棺木”（《火车到站》）；他自醒“我们都已活过了三十七岁/却既非天才，也非大师/只是用文字书写自由的/小灵魂”（《火车驶过故乡》）。虽然她也写《肋骨》《女儿身》，有一些诗作在探索作为女性的意义上走得很远，但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声音覆盖过它们，她总要回到那个写作者的自认。这个高于性别的写作者形象，在当代女诗

被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苦包围着”，姚鄂梅作为写作者，总是比普通入更敏感、更容易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惑，她把这种困惑表现出来，给人一些教训，有时是通过很刁的角度进行的。比如我注意到，她的小说常常写到孩童，一个在小学阶段或者年龄更小的男孩，甚至婴儿，这些小生命反照了大人世界的无奈，也往往成为小说故事进展的重要因素。如《忽然中年》中那个凭着近乎不真实的八面玲珑做派而进入城市富足家庭里的农村孩子波儿。《黑白键》里作为父亲黑键“一系列女人手中的接力棒”的白键，多次见证了不同女性与父亲的交往，从而展开了不同的生活面。《净身》中的那个夹在大人们中间地位十分尴尬的雷诺，他说了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大人什么都不怕，还要两个人一起睡，我们小孩却要一个人睡，太不公平了”。《摘日记》里那个意外来到世上的阿珠的孩子，成为了连接阿珠与小锐命运的因子。他来到世界上，使得小锐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也使故事有了一种开放式结尾的余韵。

我们都希望自己读到的作品具有稳健、从容的气度，谁也不喜欢小说家笔下高速列车一般的快速节奏、漫画式的夸张性格，我们更希望作家用好自己的想象，不随心所欲地敷衍故事，让生活的真相自然而然地从细节里流出来，相信有着修行者般虔诚与谨慎的姚鄂海，一定会像自己所钦佩的作家那样，“用心收集，仔细甄别，大胆取舍，千锤百炼”，锻造出更多自己理想中的金蔷薇。

湖北年轻的女作家童喜喜是一个文学潜质非常好的当代实力派小说家。成人题材小说《爱乱了》和儿童题材小说《影之翼》《嘟嘟嘟》《再见零》，显示了童喜喜不仅具有成人文学创作才华，而且具有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出众才华。一般说来，这两种思维形态很难互为转换，但童喜喜就有本事实现成功转换，仅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关注。

就这几部小说看，童喜喜的儿童文学作品内涵更丰富一些，主题也更厚重一些，艺术特色也更突出一些。儿童文学创作有自己的独有的思想艺术规律，必须尊重这些规律才会写得好。我以为，必须把复杂的社会人生主题单纯化。儿童文学要准确把握儿童的心理与接受能力，但不是把主题童稚化、低龄化，而是进行单纯化处理，变成年少读者可感知可触摸的东西。我以为，童喜喜正是依据这样的原则来铺设她的作品主题的。例如，这几部小说的主题只有一个——“爱”。她从儿童的视角去组合“爱”的故事构架，展现儿童内心中“爱”的魔力，非常有意思。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小说内涵的单调。事实上，她通过那种富有想象力的细节，把“爱”的内涵阐述得丰富多彩，可读抓人。

我非常吃惊于童喜喜讲故事时那种从容稳健甚至有些老成的叙事口吻，如《嘟嘟嘟》。这种口吻确实一直有她讲成人故事那种影子和味道。可是在讲儿童故事时，那种动物味道一点也不降低，反而增加了魅力。正是在这样的叙事口吻中，小主人公童喜喜开始了和隐形人的交往，在隐形人的世界里感受许多儿式的生酸甜苦辣，知道了成人世界许多不美好的东西，学会了如何潜入成人世界中当特务，如何把大人带回儿童单纯美好的世界中。从这大的意义上讲，小女孩童喜喜做的是和成人一样伟大的事业，那就是要改变世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只不过小女孩童喜喜构筑的是情感童话世界，而大人是一种功利竞争的世界。在这里，小女孩童喜喜的世界显然更符合人的理想，更加人性化，而我们大人，却处于异化之中。小说家童喜喜当然知道现实是很功利，也不可能是童话。重要的是她告诉我們大人要尊重孩子们可贵的天性，保护孩子们天真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一旦失去，我们人类就会迷失本性。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理念支撑，儿童世界才这样可爱动人。《嘟嘟嘟》之所以得到读者的欢迎，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展现了孩子们们创造自己世界的智慧和力量。

据有关材料介绍，《影之翼》的写作是受到日本一本写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童书的启发而创作的，内容是反映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南京大屠杀，目的是通过小男孩王杰与“影子们”的故事启发读者应该记住民族的历史。当然，小说也是在传播“爱”，用“爱”去化解“恨”，记住历史但不要延续仇恨。作家继续扮演成人世界的特务角色，让孩子们看到孩子们的爱心是多么深厚。我以为，一个年轻女作家有这样的政治意识、道德良知、文化自觉，一定要得到我们高度评价。作家童喜喜显然非常信任当今儿童读者认知能力和是非判断力，觉得应该让他们懂一些大人的事。实际上，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中也有许多中国儿童，因此，也是儿童们的事。让他们懂这段历史，非常重要。也许，他们感知民族仇恨史，也会更懂得人类之“爱”的珍贵。当然，由于主题特别厚重，作家没有来得及找到主题单纯化的方式，小说触及到真实历史内容时，叙述起来，不及讲述儿童生活故事那样流畅生动，有一些生硬之感。我并不认为是作家的失当，反而认为是作家积极探索儿童文学向真实历史靠拢时的必然过程。作家有这样一颗心，就会找到理想的表达方式，就会创造自己的故事模式。

人的诗中并不多见，甚至在当代诗人的诗中也不多见。

阿毛近十年来的诗歌中对于“这个人”的反复摹写，好像是对于自己书写者的灵魂的一种深层提醒。提醒是别一种确认。这里，既有“书页翻飞，飘满沾营者的名字/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始终在暗处/爱着水上写字的人”（《月光光》）的冷静，也有“每次面对白纸/我都舍不得写一个黑字/像面对无措的爱人，或天真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去爱，如何去爱”（《白纸黑字》）的矜持；这个人，既有“我拥有九条命/来挽救生活，和向晚的艺术”（《向晚的艺术》）的激越，也同时有“我终要让游移的词/在纸上住下来/那我们痛得最深的人/会在绝笔中出现/年青时匕首般锋利的短句/年老时绵延成回音”（《我们的时代》）的坚定；这个人，与其说是诗人的所爱，不如说是诗人自我人格的理想和印证。这里，爱人与自我又是合二为一的。他们离合纠缠，总是在一处高处相遇，成为知心。这种变奏的写作，使她的诗获取了一种特别的力量。正因为有这种宽阔襟怀和整合能力，阿毛的诗才写得风清气正。我时常想，一个诗人或一个文学家的作品的清正之气从哪里来？它只是一种风格与象征所包含的技巧吗？难道不是这个诗人或文学家自己人格的本来反映？阿毛是认真写诗的人，是认真对待文字的人，她的视野往往拉开，不拘泥于小情小事，而向着思的远道飞奔而去。

展现儿童的爱心与智慧

□宋 弓